



繁昌保卫战中的新四军指战员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區孫村鎮中分村新四軍第三支隊司令部旧址

繁昌保卫战

五战五捷扼守“皖南门户”

薛 闰 兴

繁昌(今属安徽省芜湖市)北临长江,南望九华,东接江浙,西通中部腹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新四军军部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后方基地的屏障,更是瞰制日军长江交通运输线的要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9年1月至12月,日军采取以攻为守的作战方针,先后5次进犯繁昌,企图夺取繁昌,“扫荡”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指挥下,血战繁昌,五战五捷,坚决粉碎日军“扫荡”图谋,有力打击日军嚣张气焰,守住了“皖南门户”。此举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使得国民党“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不攻自破。

预有准备。新四军成立之初,即针对新组建部队作风不够硬、秩序不正规等问题,从吃饭、睡觉、出操、队列等基础训练抓起,组织“皖南练兵”。新四军还根据日军作战特点和华中敌后平原地形水网情况,组织针对性军事技术训练,集中研究伏击与反伏击、袭击与反袭击、攻打据点等战法,很快将游击队练成正规军。1939年1月至5月,第三支队先后3次粉碎日军“扫荡”,探索实践依托有利地形机动钳制、侧后袭击、正面阻击、乘胜追击、积极反击、顽强抗击等战法,积累起“集小胜为大胜”的反“扫荡”作战经验。

1938年11月初,第三支队进驻铜陵、繁昌地区后,将主要精力放在迅速掌握繁昌地区地形及周边敌情上,并调整防御部署,抢修工事,建立群众武装。

周密部署。1939年11月8日,日军兵分三路进犯繁昌。谭震林副司令员分析认为敌装备精良,应避免与其决战,随即采取宽正面、大纵深的兵力部署,运用“小部队正面钳制、翼侧待机袭击、伏击打敌增援、向心合力包围”的战法,历时12小时击溃日军,夺回繁昌。13日午夜至14日,日军增援3次,先后投入2200余人,企图夺取赤滩,威胁第三支队后方,孤立繁昌。第三支队摸清敌意图后,为争取主动,采取“诱敌入伏、主力出击、精兵断后、跟踪追击”的战法,击毙日军指挥官川岛中佐,日军伤亡300余人后败退。

20日晚至23日拂晓,不甘失败的日军再次集结2000余人,分五路进犯繁昌。谭震林副司令员识破日军多方增调兵力,以求决战的计策,决定避其锋芒,与敌进行运动战。战斗中,第三支队采取“以小股分队实施敌后袭扰疲敌”“以排为单位节节阻击消耗敌人”“重兵

频繁出击惊扰固守孤城之敌”“集中优势兵力伏击退却之敌”“围三阙一歼灭溃散之敌”等战法,歼灭日军450余人。

12月15日至22日,日军再犯繁昌,第三支队采取“正面顽强抗击、敌后袭扰据点、要点阻击杀伤、重兵适时反击”的战法,赢得了繁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顽强抗击。正如《繁昌之战》歌词中所写,“峨山头的搏斗,塘口坝的血战……前仆后继的冲锋,把敌人打下山岗……我们英勇牺牲,不怕饥寒死伤;我们顽强战斗,粉碎敌人的扫荡”,第三支队面对日军5个波次步、骑兵大规模进攻,始终顽强抗击,浴血奋战,誓死守卫“皖南门户”,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也宣告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战略计划的失败。当时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发出哀鸣:“国民党乃是手下败将,惟共产党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同仇敌忾。第三支队针对敌后作战特点,按照“支队有民运组、团有民运股、连有民运组”的原则,健全民运组织。进入皖南地区后,第三支队立即组织民运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乡、每保,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帮助保村护乡,解决

群众疾苦,以“不害民、不扰民”的模范行动,赢得皖南地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同时,通过恢复和健全地方党组织,建立动员委员会、难民后援会、抗敌协会等抗日组织,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等,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激发群众抗日热情,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繁昌保卫战中,人民群众纷纷参战支前,自发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特别是繁昌猎户队,有力地配合第三支队实施诱敌深入、渗透袭扰等行动,使进犯繁昌之敌陷入群众武装的包围之中。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是新四军反“扫荡”斗争的一曲胜利凯歌,更是繁昌地区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结果。

1940年1月6日的《抗日报》这样评价繁昌保卫战:“在皖南前线创造了机动而顽强的防御战的优良战斗作风。”“新四军《抗报》评价繁昌保卫战是“芜湖失守以后最大的血战”“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粉碎了敌人‘扫荡’皖南的野心,屏障了皖南大后方的徽(州)屯(溪)重地”。

史说新语

百战奇略

原典

《百战奇略》必战篇原文为: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君主,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孙子兵法·虚实篇》)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必战篇认为,凡是出兵深入敌境作战,如果敌人坚壁固守,不与我交战,试图拖垮我军,我军就应当进攻其国君所在之处,摧毁其大本营,切断其归路,截断其粮草供应。这样敌人必迫不得已与我交战,我派精锐部队进攻,便能击败敌人。正如兵法所说:我军想与敌决战,敌人虽凭据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与我决战,是因为我军攻击了他们必须援救的地方。

战例

公元238年,魏明帝派司马懿率兵4万北攻辽东公孙渊。公孙渊率部数万屯辽隧(今辽宁省海城市西北高坨子附近),依辽水围堰20余里,阻击魏军。司马懿以主力暗渡辽水,直捣辽东郡治所在地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公孙渊被迫回师救援襄平,行军至首山,被魏军击败。后司马懿困襄平,公孙渊兵疲粮竭,突围出逃,被魏军斩杀于梁水边。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准备渡江西进。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田頌尧部共53个团,沿嘉陵江西岸布置防线,企图凭险据守,将红军堵在东岸。4月,红军占领要隘剑门关,打掉敌江防重要支撑点。随后红军直趋川西军事战略重镇江油,震撼成都,使川军邓锡侯部受到直接威胁。为解成都之围,邓锡侯拼凑18个团的兵力大举增援。红军调动敌人后,以1个师继续围困江油,另以约4个师兵力在江油以南地区伏击敌之援军,经两日激战,大败敌军。

姚 君 潘 金 桥

攻其所必救 辽东之战与嘉陵江战役

数字背后的淮海战役

李 琳 甘 晓 妹 胡 绍 武

链接历史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场战略性进攻战役。今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胜利72周年。

6昼夜、12万米、73封、80余万斤、2500余里……一组数字,再次唤起人们对72年前黄淮大地上那场胜利的回亿。

6昼夜

1948年12月4日,从徐州仓皇逃窜的杜聿明集团被华野主力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杜聿明采取三面掩护,一面突围的战法,集中炮火坦克,在空军掩护下向南突围。邱清泉兵团作为开路先锋,沿引河突围。我华野第10纵队鲁楼阵地成为首要攻击目标。粟裕代司令员指示,一定要守住鲁楼。

在数十辆坦克和大批轰炸机配合下,敌军采取宽正面、多批次的战法向我集团滚动进攻。我军将士从塌陷的工事、堑壕中跳出来,从炮弹翻起的焦土中钻出来,从血泊中站起来,顽强抗击数倍于我之敌长达6昼夜,终于粉碎杜聿明集团沿引河夺路南逃、与黄维兵团靠拢的企图。

12万米

在围攻中采用近迫作业,是淮海战役中我军战术运用的典范。尤其是在双堆集战场,黄维兵团作为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兵力与我中野主力相差不多,装备

右图: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 下图:江苏省徐州市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塔



武器则占据绝对优势。为减少伤亡,中野推广迫近作业的壕沟战术,以地堡对地堡,战壕对壕沟,开展起“地平线下的战斗”。

各部队冒着严寒和绵密的火力封锁,在平原地区进行工程浩大的迫近作业,将堑壕逐步延伸到黄维兵团阵地前沿几十米处,构建起完整的攻防阵地。据统计,双堆集战场我军的主要交通壕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为围歼黄维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73封

淮海战役发起前及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主席共向淮海前线发出73封电报。最紧急时,2小时内发出3封电报,其中既包括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兵力



使用原则,又有“攻取宿县、隔断徐蚌”等对战斗及时有力的指挥。

80余万斤

1948年12月16日,正值新年来临之际,中央军委电令慰劳参战部队,每人供应一斤猪肉,共需80余万斤。为完成这一任务,华东局一面迅速把任务分配给各地委,从群众手中征购,一面直接到集市上收购。泰西县委召开区长联席会议,发动群众收购猪肉,很快完成任务,并超额征购2.7万余斤。

2500余里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中,华野第2纵队团以上单位共进行攻防战斗50余次,歼敌36517人。从向南进发阻击邱

清泉兵团,到追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直至北上截击杜聿明集团,坚守郭楼,我军指战员一路追击,转战路程长达2500余里。

2077万余斤

淮海战役中,军粮加工基本靠后方群众碾米。据统计,渤海行政区(1944年设立,1950年撤销)28个县的群众用1.8万盘碾子,为前方碾米2077万余斤。支援淮海战役的消息传到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县柳行村,全村热烈响应。20名妇女在妇女会长李芝香的带领下15天碾米4500斤。她们还编出碾米口号:“碾出小米送前方,打倒老蒋保安康。”

(图文资料提供:徐州市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管理局)

计谋分析

找准要害。必战是深入敌境的“客”军,对坚壁不战之“主”军作战的原则。通常而言,主军占据天时、地利与人和,往往惯于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不急于发起决战。因此必战的根本在于逼迫主军“不得不与我战”,这就要求客军找出既是敌人弱点又影响其后续力量的要害部位,即能够牵制敌人的关键位置。找准要害,即可实现“蛇打七寸”。在古代,国君所居一般为全国政治中心。因此,“攻其君主,捣其巢穴”必然能够调动敌人回援,迫使坚壁不战之敌脱离坚壁固守,客军便可于运动中歼敌歼灭。现代战争中,“攻其必救”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理方位,自然天候、后勤装备保障能力、科技和人才等都将成为敌之要害,这也为“必战”赋予了新的内涵。

灵活指挥。知变则胜,守常则败。要看到,准确找到影响主军作战潜力的核心要害并不代表必战的胜利,想要达到敌“不得已而须战”的目的,还需根据敌方实力和作战意图,灵活运用各种战术手段针锋相对,“釜底抽薪”“捣其巢穴”也好,“截其归路,断其粮草”也罢,都是具体作战方式,目的是逼迫主军按照我所设计的方案行动,牵着对方的鼻子走。辽东之战中,面对筑有20余里防线的公孙渊部,司马懿区区4万兵力正面强攻必不易取胜。此时司马懿选择直捣襄平调动公孙渊,在运动中歼灭其主力。而面对兵疲粮少的襄平城,司

马懿则用围城困敌的方法,迫使公孙渊粮竭弃城而逃。面对同样的敌人,司马懿根据不同敌情,采用不同战法,达成战略意图。我军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创造的“围城打援”“攻城打援”等战法,也是对必战灵活指挥的运用和发展。

确保优势。“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要取得必战胜利,瞄准主军之软肋击其要害固然关键,但还要看到,要害可能并不虚弱,甚至是敌之战略防御重心。此时,贸然“打七寸”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引火烧身。因此,通过“攻其所必救”充分调动主军的同时,还需在敌“不得已而须战”之时,保证兵力优势,确保能够取胜。既要保证在敌所必救的方向投入足够兵力,对敌构成有力威胁,也要防止因分兵而在其他方向形成薄弱部位,给敌可乘之机。嘉陵江战役中,红四方面军以1个师的兵力围困江油,另以4个师的兵力伏击援军。敌军进入伏击圈后,虽一时措手不及,但凭借装备火力和飞机掩护的优势,很快稳住阵脚,与红军缠斗在一起。此时江油城中的敌人也主动出击支援,若红军力量调配不合理,就极有可能被敌突破,反对造成两面夹击的局势。由于我军战前合理调配作战力量,江油出援之敌很快被截断歼灭,伏击圈中的敌人经两日战斗后也阵脚大乱,溃逃而去,从而确保了我军作战胜利。



1935年5月,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的红四方面军一部